

书局旧踪 SHUJUJIUZONG

书局旧踪

郭汾阳 丁东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旧踪
JIUZONG

书局旧踪

郭汾阳 丁东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旧踪
JILU ZONG

书局旧踪

郭汾阳 丁 东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URL: <http://www.jxep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南昌市丁公路 120 号 330002)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装订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路 636 号 330009)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毫米×1230 毫米 24 开本 7.25 印张 插页:2

155 千字 印数:1-5245 册

ISBN 7-5392-3127-0/G·3047 定价:1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老书局的故事,也可以说是现代出版家的故事。

中国现代的出版家,往往与作家、学者、教授一身数任。一个人,可以在创作、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经营领域里全面出击,纵横驰骋,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既是一个文化产业,也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社会角色的基本方式。这些故事,在本世纪上半叶是有声有色地上演过的,辉煌过的。只是到了 50 年代,在计划经济格局里,这个传统中断了,教师就是教师,作家就是作家,编辑就是编辑,出版工作者就是出版工作者,每个知识分子都隶属于一个具体的工作单位而别无选择,那种一身数任的文化背景不复存在,出版大家也不复产生了。当你回首那一代大家的时候,有时竟会惊讶,他们的生命哪来这么大的能量?其实,人是有那么大的能量的,知识分子是能起那么多作用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让人尽其才、大家辈出的环境。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在纪念百年华诞的时候,印了两本书目,前五十年是厚厚的一本,后五十年是薄薄的一本。两相比较,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如今,中国重新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知识经济将成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出版业无疑地处于火车头的位置中。出版家与作家、学者、教师的角

色整合的可能性再一次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福音,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挑战。市场是一双刃宝剑,它既给知识分子以广阔的用武之地,同时也会诱惑知识分子忘掉精神世界的追求,而放弃自身的角色功能和作用。如何在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的同时,坚守社会良知,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向 21 世纪的新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 20 世纪没有答完、21 世纪还要继续回答的老课题。

如果本书追述的现代出版界的这些老故事,能够对以上问题有所裨益,也算是笔者对这些课题的一份小小的答卷。

•

目录

前言	(1)	王云五害怕工潮	(50)
第一人王韬	(1)	胡愈之的梦	(54)
不要太丢中国的脸	(3)	永在的复社	(57)
《新潮》的涌起	(6)	胡愈之的长处和烦恼	(59)
新潮社的辉煌	(9)	老“商务”一个最特别的人	(62)
创办北新书局的李小峰	(12)	胡适与“商务”	(65)
施存统的怪圈	(14)	茅盾与“商务”	(69)
老舍之死	(17)	东方图书馆祭	(72)
蔡元培来者不拒	(21)	“商务”开架售书	(76)
热烈的高梦旦	(23)	世界书局与沈知方的经营术	(78)
一颗巨星的升起	(27)	老书局的几个绝招	(81)
捐木梢精神	(30)	不开明中出“开明”	(83)
两大书局的竞争	(32)	“开明”的三大扛鼎之作	(87)
严复的“八大名译”	(35)	开明人	(89)
“自繇”与自由	(39)	开明风	(92)
张元济的圣人气象	(42)	顾颉刚下海	(96)
张元济的刍蕘之言	(45)	想起张静庐	(99)
胡适举贤荐师	(48)	《译文》风波	(102)

《新生》事件	(104)	亚东不出“烂污书”	(138)
“作家书屋”坑作家	(106)	巴金的老书局	(141)
张申府与章乃器	(109)	自由价更高	(145)
假如鲁迅还活着	(112)	三德里的小伙计们	(150)
美的书店	(115)	邵洵美和金屋书店	(153)
“△”生产厂	(117)	从“北新”到“三闲”	(155)
旧上海的扫黄	(120)	鲁迅为什么办书屋?	(158)
望平街一幕	(122)	郭沫若和他的“群益”	(160)
两篇檄文遗精神	(125)	韬奋精神	(162)
不倒的“良友”	(130)	孙寒冰与大时代书局	(165)
“良友”的《新文学大系》	(134)	俞鸿模和海燕书店	(167)

第一人王韬

第一人王韬



王 韬

王韬原名王利宾，化名黄畹，曾为太平天国上条陈，出谋划策，被清廷缉捕，落荒而走香港，以后便改名为韬，号天南遁叟。他是从长夜中探出头来最早领教西潮的“狂士”，也是在中西文化交锋中痛苦煎熬的弄潮儿。

王韬参加过 1843 年上海开埠时洋教士开办的近代中国第一家老书局，任墨海书馆的译述和校对。三十年后，他又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再过十年，他开设戮园书局，以木活字印书，十余年间印书四十余种（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黄遵宪

的《日本杂事诗》等);他又是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开拓者,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家报纸是中国近代首家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阵地。王韬首创每日报首刊登“论说”,揭开了新闻史“政论时代”的序幕。那每日报首千字左右的“政论”,短小、集中、鲜明、浅显,从此成为一种簇新的报刊文体,文人利用它论政从此发源,后发扬光大为“任公体”,则是满目霞光了。《循环日报》之后,王韬还参予办《华字日报》等报刊。1882年他汇编成册的《韬园文录外编》,是中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开启近代文化人“立言”的新方式。以上种种,遂有人称之为“新出版和新出版业第一人”,这“新”就是不同于古代出版活动的崭新经营目的、经营作风和活动内容,用一句话来点破它,就是“为政治而立言”(新闻界人物编委会《新闻界人物》第1辑)。

“为政治而立言”,是从西方学来的。王韬看到“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论,人心之所趋向也”(同上)。返顾中国,王韬有三篇宏论:《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这是中国最早的报刊思想专论,王韬因此而成为近代最早具有办报思想的专家。不过王韬是在香港形成他的认识的,冀望理想主义的“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事,位至卿相。国家有大战事,秉笔从戎,随营纪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尔尔,却直如梦幻。清议纵横,言论自由,是遥远的路程,“诚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博采舆论,何以措置咸宜”,须得有一民主而非专制的语境,王韬“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终难以见效。倒是日本维新的知识分子推崇王韬为“今时之魏默深(魏源)”,并邀请他访日,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王韬的时代,报馆、书局、印刷厂等等是不分彼此的。他的开创之功,今人不该忘记。“我国近代新闻和出版史上,出现过很多文人办报、办出版的,目的大半为文化进步。他们秉七寸之笔论衡时政,曾发生无数光、热、影响,但罕见能长期维持或建立规模”(汪家熔《新出版和新出版业第一人——王韬》)。而王韬就是罕见者。

不要太丢中国的脸

不 要 太 丢 中 国 的 脸



钱玄同

书 局 旧 踪 · 不 要 ³ 太 丢 中 国 的 脸



独秀文存

多方写信。北洋政府一面否认有禁书的事情，说检阅的书已经发还，一面却查禁如故。”(唐弢《晦庵书话》)胡适“多方写信”，今能得见其致教育总长张国淦信，说：“曾以警厅禁卖《胡适文存》的事奉询”，“据云，《胡适文存》及《独秀文存》并未曾禁卖”，“但迄今已近一月，而警察仍在干涉各书摊，不许他们发卖这两部书，前次没收的书也并不曾发还”，胡适不禁问：“我想再奉托先生再为一问，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作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为什么要没收小贩子出钱买来的书？”(《胡适来往书信选》)其实，禁你的书还需要理由吗？

五四运动以后，宣传新思潮的《每周评论》、《新社会》等相继被查封。1922年冬，北洋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仍以《每周评论》、《新青年》的成员为迫害对象，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钱玄同化名“夏”编撰了一条谜语，意在“为了揭发事实，故意转弯抹角，掉弄笔头，以引起社会的注意”(周作人《北大感旧录》)。

这一信息公布后，引起反响。后来唐弢说：“胡适便据此四出活动，

不久,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拿起今天的晨报第六版来看,忽然看见《警察厅定期焚书》这样一个标题,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虽然我并不知道这许多‘败坏风俗小说及一切违禁之印刷物’是什么名目”(《胡适来往书信选》)。“败坏风俗”就是堂而皇之的理由,“从古代到近代,从外国到中国,‘败坏风俗’几乎成为禁书焚书的共同口实,前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利用过它,后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也利用过它”(唐弢《晦庵书话》)。禁你的书算什么?君不见还有“定期焚书”吗?胡适看到“便衣侦探把一张禁售的书单传给各书摊”,除了他与陈独秀的《文存》外,分明还有世界名著、嘉本德的

《爱的成年》以及周作人小品文学的集结《自己的园地》等,胡适不免以为“这种昏谬的禁令实在太可笑了”,这除了说明统治者的凶残和虚弱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还是当时胡适给教育总长张国淦的信中说得好:“盼望先生们能设法消除这种笑话,不要太丢中国的脸。”



《每周评论》杂志

《新潮》的涌起

《新潮》的涌起



《新潮》杂志

1919年1月,北大傅斯年、顾颉刚、徐彦之、罗家伦等学生发起一个团体叫“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与另一个刊物《新青年》相呼应。

几个毛头小伙要办刊物,钱从哪里来?因为是办文艺刊物,便去找文科学长陈独秀。陈独秀见是国文系黄侃的得意门生傅斯年来相求,便怀疑他是敌视新文学的“九头鸟”黄侃派来的间谍。但因为有胡适作保,陈独秀爽快地说:“只要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傅斯年《回忆〈新潮〉和〈新青年〉》)这真是令今天全国高校文科学生羡慕的回答。于

是,《新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

有了人——傅、顾、徐、罗以及康白情、俞平伯、杨振声、吴康、毛子水、张申府、汪敬熙、谭平山、高元、成舍我、孙伏园、高君宇、李小峰、王伯祥、江绍原、何思源、潘家洵、郭绍虞、孟寿椿以及校外的叶圣陶,真是囊括一时之选;有了钱——陈独秀的许诺;也有了办刊物的地方——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欣然在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新潮社的社址;那么,印刷、发行等等的琐屑事怎么办呢?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热心肠,全部代为安排妥贴,印刷由北大出版部印刷局负责,发行也由出版部负责。

《新潮》便这样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出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冉冉升起一颗新星!多么好的学校领导(还有决定拨教育经费支持这个刊物的校长蔡元培)!多么好的学校后勤!多么有志气的莘莘学子!

北大刊物的“二新”——《新青年》、《新潮》,前者对象是社会上的成年知识分子,后者则是中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所以,《新潮》的宗旨便是“尽力研究修学立身之方法与途径”,它“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莫过于青年学生。迹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这办法即是“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代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

《新潮》的宗旨,很快在社会上酿成风波。它使用白话文,遭到林琴南、马通伯、胡先骕等人攻击;发表的新文学作品,与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也格格不入,他们主张文学也是可以“用作改革社会器械的”;执政者对《新潮》更是不满,大总统徐世昌、教育部长傅增湘发出逼令蔡校长有所收束的函件,国会议员张元奇也在安福俱乐部唆使下提出查办蔡校长的议案。

但是,全国青年却对《新潮》望眼欲穿,远在杭州“一师”的施存统来信

说：“敝校近来颇有改革的气象，同学关于新文学、新思想也极注意。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君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人也有三分之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许钦文后来回忆：《新潮》等等，“都为好学的青年所注意，报刊、书籍，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凡有新的好书，如果不寄给朋友看，好像是对不起朋友似的。友谊往往建筑在书籍的借阅、赠送和学术的讨论”（《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

《新潮》日趋火爆，经销处遍地开花，当时一般书店是不愿接受新的书刊的，倒是学校、报社、图书馆、教育会甚至个人占了经销、代销的多数，甚至有绸缎庄也代销《新潮》。这种景象，今天是见不到了。

新潮社的辉煌

新潮社的辉煌

新潮社不单单是一个新文化新文学团体,也是一个现代出版机构,除了《新潮》这个杂志,还出《新潮丛书》,其中有宣传“赛先生”的陈大齐的《迷信与心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宣传“德先生”的陈达材的《政治原理》、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以及“德”、“赛”两先生并驾齐驱的《蔡子民言行录》和陶孟和的《社会问题》;文学则有周作人选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的《点滴》。

新潮社的编辑是胡适的左右臂傅斯年、罗家伦及毛子水、顾颉刚、孙伏园、陈达材等,周作人后来做了主任编辑。这些都是新文坛的高手。张东荪对《新潮》有所批评:“把功夫用在中国书上,实在不值得。与其做泥中扑斗的生涯,何如做进修益智的事业。”(《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当时张东荪还不是“新儒家”,而力倡西学,《新潮》便大力介绍“西潮”,杜威、武者小路实笃、克鲁泡特金、弗洛伊德等等接踵而来,步入中国思想界。虽然显得厚重了一些,但《新潮》前期的锋芒倒显得褪色了。它原来是“我们的议论,总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懂得什么叫客气,什么叫顾忌。——总而言之,什么叫不可说。要说就说,说还要说尽”。而后来,如鲁迅所言:“《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预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介绍’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蔡子民言行录》和七千部《点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蔡校长的“言行录”印了万部,周作人的翻译也印了7000册,这都不是

小的数目，终于也就卖不动，再加上傅、罗等人放洋出国，于是露出窘相，好在周氏兄弟扶佐新人不遗余力，推出《新潮社文艺丛书》，包括《桃色的云》（爱罗先珂剧本，鲁迅译）、《陀螺》（诗歌小品集，周作人译）、《纺轮的故事》（孟代童话集，李小峰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孙伏园译）、《论理学》（琼斯著，李小峰等译）、《古佛教》（戴维斯著，江绍原译）等。

当时一般书店如鲁迅所说：“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出版之际，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花本钱，四欲大发其财。”李小峰进一步剖析：“因为要安全，便不敢印进步书籍；因为要多售，便迎合时好，不顾稿件质量；因为要不花本钱，便粗制滥造，不顾印刷质量；因为要大发其财，便压低稿酬，剥削作者，抬高书价，剥削读者。”新潮社则反其道而行之，社团出书不在谋利，而在宣传学术，传播文化。所以，“一切都自己来，自己著译，自己设计，自己定价，自己发行，不受书商的掣肘，完全自主，就有条件来掀起一次出版界的大革新，印出一批兼顾内容和形式的好书”。内容要好，形式上，纸张不用报纸和粗糙的书面纸，用道林纸和重磅木造纸，以及各色精制的书面纸和布纹纸；印刷，不去找“小印刷厂”，而挑北京设备最完善、技术最高明、印刷最精美的印书局。而且“字体要秀丽，墨色要有光彩”；版式，一反一般图书“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要想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迫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人生已没有余裕了’”。在每本书“里封面之前、版权页之后，各留一二张空白副页，天地头放宽，每篇的题目前后留下几行空行，每篇另页起，至少另面，行与行之间保持相当距离。这样，版式就显得疏朗悦目，且有余地写上一点读后的意见。”装帧，封面设计多样化，又“用穿线订，翻开来比较服帖”，再就是鲁迅是“毛边党”，“让读者一面看一面裁，可以细心看，不致草草翻过”，不过也不固执，可以“随作者欢喜”。书价呢？当时一般书籍的成本，包括印刷及稿酬在四成左右，加上批发折扣及开支占三成，利润可达三成，“我们降低书价，把印刷和稿酬的成本提高到七成，而从批发开支的三成中竭力设法节约出来，作为再生产的资金”，结果便是“书店用报纸印的定价五角的书，我们用道林纸精印，定价不会超过三角半”。至于稿酬，“我们规定的版税率从当时一般书店最高的标